

东方历史评论·影像



主编 赵省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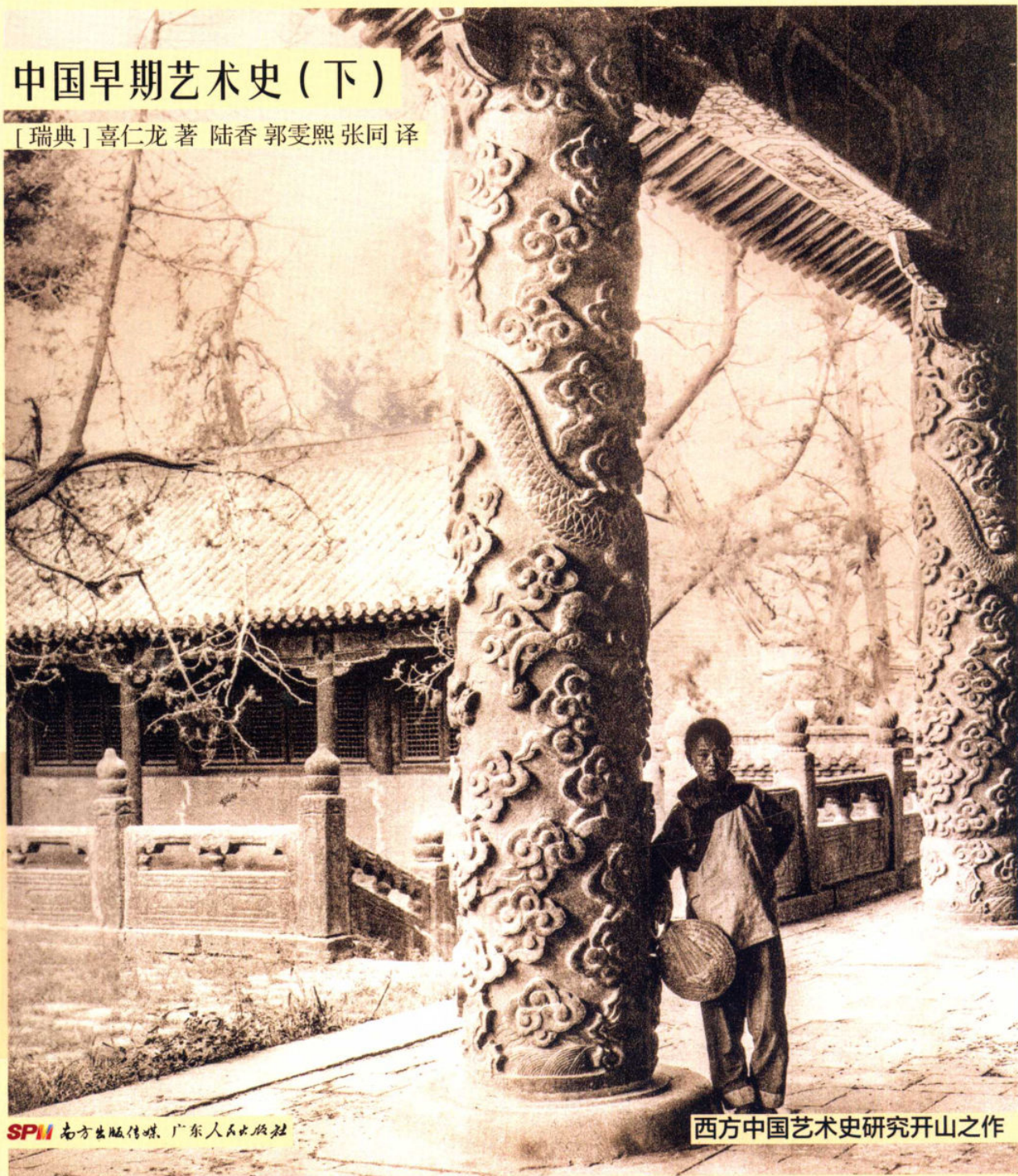
| 第十七辑 |

西洋镜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中国早期艺术史（下）

[瑞典]喜仁龙著 陆香 郭雯熙 张同译



SPH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开山之作

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第一代领军人物 对梁思成、林徽因影响至深的发轫之作 众多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惨遭破坏、消失前的珍贵影像

在众多收藏家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倾力协助下，本书展现了大量珍藏的艺术品。他们不仅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素材，还允许我拍摄了大量照片，这是前所未有的。

—— 喜仁龙

他（喜仁龙）被中国城墙、园林、宫殿、雕塑和绘画的美深深打动，以至于宁愿放弃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职位来探索中国艺术。他在中国流连忘返，一再推迟归期，并且告诉斯德哥尔摩大学，如果不能够延长他的假期，他情愿放弃教授职位。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 叶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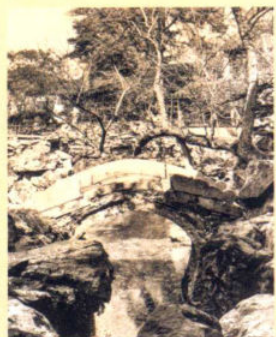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两侧的四大天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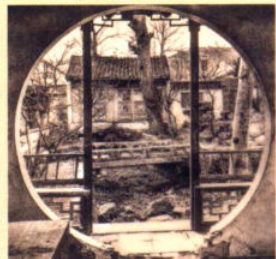
纪念贞洁烈女的大理石碑坊

碑坊是一种重要公共建筑入口的标志——比如大部分孔庙和衙门的入口。有时它们也单独作为纪念性建筑存在，如安徽徽州城外河流对岸的平原上建碑坊纪念文天祥未竟英雄的功业。



苏州怡园小溪上的石桥

夏天，园内一池碧波荡漾，树木倒影交错，令人心旷神怡。亭台楼阁与自然景色相融合，在水中形成优美的倒影。连同轻盈地跨在石上的石桥（图23），共同组成一幅和谐美妙的画卷。



苏州拙政园月亮门

上架建议：老照片·历史

ISBN 978-7-218-13575-5



9 787218 135755 >

定价：228.00元（全二册）

赵省伟 主编

| 第十七辑 |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东方历史评论·影像



西洋镜

中国早期艺术史（下）

[瑞典]喜仁龙 著 陆香 郭雯熙 张同 译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SPII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1 引言



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自上古时期开始，中国建筑的发展就与自然联系紧密。中国人通常会根据土地神和风水规划建筑，根据天上的星宿排列设计宫殿，在早期，他们用于祭祀土地神的圣坛都是露天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者的建筑活动，处处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是中国建筑的灵魂。如果一座建筑达到了这一点，就说明它在艺术上实现了成功。从严格的建筑学原理来看，中国建筑的美感和特征有时让人难以理解。中国建筑的设计往往很简单，缺乏我们在世界其他伟大建筑上所见到的稳固性和构造上的均衡性，却有着自己的魅力，即实现了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基座平台上高高竖立的木柱子，像山上的高大树木一样高；远远伸展出来的屋顶曲线则像轻轻摇曳的长长柳枝。在宽檐、阔廊、窗格和栏杆的光影衬托下，凹在里面的墙壁，与建筑自成一体。

与其说中国人通过建筑的外在形式表现自然，不如说中国人是通过建筑形式努力表达他们对自然的理解。不论中国建筑，还是中国国画和装饰艺术，人们都能从中探寻到对生命活力、事物运动或者创造力源泉的表达，即阴阳。尽管这种表达在实际建筑过程中会有一些修饰，但是对阴阳的体现无处不在。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建筑中的元素在设计之初就有着它独特的象征性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元素被遗忘，有的则因与实际构造理念相重合而变得模糊。这种现象甚至在一些楼阁的名称中也有所体现。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发明了一套建立在均衡的数字关系基础上的系统（这些数字关系通常来源于古人的天文观测），这种系统在设计大型的宗教或仪式性建筑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以后会提到。在这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总体来看，大多数重要的中国建筑，其设计理念都离不开他们努力要表达的观念。作为中国建筑的一种规则，这种设计与西方的审美观念迥然不同。

中国建筑的特点虽不是千篇一律，但还是具有比较意义上的一致性。千百年来，中国建筑不仅在构造系统上大体保持不变，而且在建筑物的朝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外观上也是如此。尽管有时会有一些创新以及特殊的建筑形态出现，但是大多数建筑的风格都高度相似。因此从年代较晚的建筑中，我们可以获得早期建筑的知识。中国早期建筑遭到彻底破坏，部分因为建筑材料的耐久性较差，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保护早期建筑的意识（这一点与日本人恰恰相反）。事实上，除了陵墓之外，中国人不会费力建造永久坚固的居所。在中国，历史最为久远的遗迹往往是陵墓，其次是一些石窟和塔。若想了解中国早期的宫殿庙宇，我们需要借助地方志、一些小型的泥塑复制品，以及晚期的同类型建筑进行类推。但是由于建筑材料太过繁杂，我们只能对一些主要类型进行讨论。

2
城墙

中国现存最引人注目的地面建筑当属长城，因长城绵延上万里，中国人将其称为“万里长城”。对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来说，长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建筑遗迹，不仅因其广阔绵长、十分独特，还因为它是中央王朝强盛时期的象征和标志。

据说这项浩大的工程由秦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下令建造。秦始皇四处征战，使四分五裂的天下实现了大一统，他计划修建一堵除海岸线之外围绕整个帝国的城墙。就是说，就像帝国内的城镇和村庄被城墙围起来一样，秦始皇希望将整个帝国用城墙包围起来。当然，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理解这个传说。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中国北方地区就已经建造了防御性城墙，只是它们的构造比较简陋，相互之间也不连贯。我们今天见到的长城最坚固雄伟的部分明显是后来修建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能通过古代史官的记载得知，秦始皇统治期间完成了长城的大部分修建工作，但具体修建了多少却不得而知。成千上万的囚犯、战俘以及那些激怒皇帝的顽固儒生被发配到边疆，为这项工程搬运石头和泥浆。被繁重的工作耗尽生命后，他们的尸体也成了城墙的一部分。君王的铁血意志支撑着这项浩大工程的运转，只要是人力所能克服的，在当时都能全部完成。不过从中国建筑的发展阶段来看，当时修建城墙的应该不是砖头，而只是一些由泥浆和沙砾组成的混合泥块^[1]，后经石板加固而成为壁垒。从秦朝到明朝，虽然屡经大规模修缮和重建，但长城的面貌和构筑方式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如今，长城现存各部分的价值和外观都不相同。它从帝国一头的大海延伸到另一头的沙漠，东起河北省的山海关，西至甘肃西部、离西藏不远的嘉峪关，穿越的路途漫长遥远，跨越的地形变化多端。长城在两端之间蜿蜒延伸，其迂回曲折的路线不禁令人惊讶。有的地方形成了深度曲线甚至回环，有的地方则分散出多条支线以保护商路或划分省界。长城的第一个大回环位于北京北部的南口镇。两条支线从这里平行分出，跨越山西北部（绥远）后，汇合于黄河。还有一条支线向南延伸，成为山西和直隶的边界。长城从黄河开始转而向南，沿着陕西省的北部边界，第二次横穿黄河继续向西部延伸，将鄂尔多斯与内蒙古其他地区分隔开来，然后进入甘肃，在兰州北部形成两个回环之后，又紧紧沿着内蒙古边界继续向西北方向延伸。

由于没有精确测量或制作过长城地图，长城的实际长度目前还不得而知。

[1] 应为夯土。——译者注

但是据相关资料称，长城的长度大概可达 2400—2720 公里，相当于从法国的马赛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1]。如果算上长城的回环和支线，总长度估计会达到约 5000 公里^[2]。不管长城到底有多长，显然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没有如此长度的防御性工程。

毋庸置疑，千百年来长城在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中原方面一直发挥着有效的堡垒作用，同时也限制了中央王朝的人口流动。即使不用砖石构筑，当时的武器也无法破坏城墙的防御。除了在南下通往中原的要道上修建有特定的关口外，在身负武装的士兵防守下，长城其他部分也很难翻越或洞穿。1790 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对长城有一段贴切的评价：“如果没有长城，中原富饶的省份就不可能免受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同时长城也固定了中原王朝与北方部落的边界，王朝内的犯法者以及对统治不满的人被圈定在国土之内，无法逃脱。”^[3]

长城有五个最重要的关隘。第一关为山海关，控扼通往满洲地区^[4]的道路；第二关为古北口，是热河通往中原的门户；第三关为张家口，是外蒙古的库伦^[5]通往中原的要道；第四关为雁门关和丰镇关，分别位于长城的两条平行分支上，将山西和内蒙古分隔开来；第五关为嘉峪关，是中国与北方的蒙古和中亚的边界关隘。这些雄关都处于依凭天险的易守难攻之地，防御工事坚固，能够有力地抵御外族军队的入侵。除了以上这些主要关隘外，还有一些在不同时期修建的小型关隘，也都防御坚固，并有戍边军队驻扎其中。关隘中起主要防御作用的是塔楼。从很早开始，关隘就有一些用石头砌成的塔楼，这些塔楼之间的距离恰好在塔楼上弓箭手的射程之内^[6]。

不同地段的长城，其结构和外貌有很大的不同。这与邻近地区的地形以及当地所能提供的建筑材料有关。不过，有的经过重新翻修后结构发生了变化，有的则遭到遗弃，破败不堪。长城最古老的部分位于西段，主要分布在陕西和甘肃境内。因为西部贫瘠

[1] 今伊斯坦布尔。——译者注

[2] 威廉·埃德加·盖洛 (W. E. Geil)，《中国的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伦敦，1909 年，第 175、327 页。虽然该书作者实际走过长城全程，但是书中未提到长城的长度。卢瑟·牛顿·海耶斯 (L. Newton Hayes)，《中国的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上海，1929 年，第 12 页，该书主要对长城的东段做了简略的研究。

[3] 乔治·伦纳德·斯当东 (George Staunton)，《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伦敦，1798 年，第 2 卷，第 183 页。

[4] 今中国东北。——译者注

[5] 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译者注

[6] 参见卢瑟·牛顿·海耶斯，《中国的长城》，上海，1929 年，第 15 页。明朝成化年间 (1465—1487 年)，守将奏报朝廷，其麾下总计士兵 25 个营，每营有 100—200 人，共镇守着长达 480 公里左右的长城，平均每人负责 180 米，大约 9 个人就足以涵盖 1.5 公里的范围。这份军官的奏折表明，在弓箭等冷兵器主宰战场的时代，长城的防御功能不容忽视。朝廷为表彰守卫将士，将他们在长城内外驻扎的土地赐给他们使用。

的沙漠地区不出产砖头和建筑石料，所以长城这一部分只是一些泥土夯成的土墙，沿土墙设有壕沟。与远在西部的长城西段不同，长城东段经常出现在图片中，比较知名，是整个长城的代表（图1）。该段长城的外观几乎与北方大型城镇的城墙无异。墙体以内以泥浆、沙砾和石块分层堆砌，外部覆盖着几层大块的砖头，再以坚硬的灰浆填充。长城底部垫衬的石块间严丝合缝，城垛之间的高处平台铺设得很细致，这样可以防止水渗入到墙体之内。其底部可达7—8米宽，城垛平台宽5米，两侧在建筑过程中经受过连续猛击的检验。其高度一般与底部的宽度相当，有时甚至可达9米左右。顶部很宽，两边设有便于瞭望和射击的城垛，高约1.5米；墙体上每隔不等的距离设置有塔楼，高度可达3.5—4米。许多塔楼看上去比墙体还要古老，这或许是因为塔楼先行建造而成，然后才建造蜿蜒的墙体。除此之外，每隔较长一段距离还筑有更高的烽火台。这些烽火台的功能不是防御，而是为了更好地观测敌情、传递军情。

如上文所述，长城东段的建筑方式、建筑材料与北京城墙基本相同。可以肯定的是，其建筑时间也与北京城墙基本一致。明朝早期竣工的北京城墙和明长城都是明朝宏伟建筑的典范。这一点通过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可以证实：“随着蒙元的灭亡，蒙古部落虽然被驱赶到北方，但仍然对中原构成威胁。明朝早期对长城的彻底重修，正是出于加强北部防御的需要。”

因此，现存长城的宏伟主体不是秦朝的建筑成就。前面说过，目前无法得知秦始皇统治时期到底修了多少长城，也不清楚秦长城是怎样一番模样，但是围绕帝国修建一个大型防御体系的概念是秦始皇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的提出与秦始皇广为人知的其他规划和成就非常吻合。长城概念的提出要比实际的建筑影响更大。使四分五裂的中国北方紧密结合成一个整体以对抗共同的敌人，长城确实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中国古人对城墙有着根深蒂固的崇拜，整体来看，长城就是这种崇拜最有力的体现和表达。长城最宏伟的部分具有壮观的建筑效果，仿佛是从当地的风景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像是一顶天然的王冠覆盖在草木不生的山坡上。长城气势恢宏，整齐划一却又变化多端，护墙与塔楼，一高一低，其划分颇有节奏，仿佛一条蜿蜒的长龙，从脚下延伸到远方，一眼望不到边际。

可以说，城墙在中国建筑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无穷无尽的城墙就像中国古代社会的骨骼，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几乎每个中国城镇都被城墙包围，内部也通过城墙划分，人们的社会活动也在城墙内进行。中国人在为周围有城墙的城镇命名时，都带有一个同样的汉字“城”，这也体现了城墙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在中国，一个城镇如果没有城墙就好比一座房子没有屋顶，是难以想象的。

早期的城墙只是一些用泥土构筑的壁垒，这种壁垒就是中国北方众多村镇的防御工事。到了后来，人们开始用砖头覆盖原始的壁垒，在由石块、沙砾和泥土砌成的墙

体上连续包裹多层砖头(图2)。例如,北京城的城墙上,可以看到厚达五到六层的砖砌面。因此,城墙不仅是中国古代城镇最重要的建筑,也是最永久、最壮观的建筑。更重要的是,这些宏大的实体建筑赋予了城镇一种统一和不朽的建筑品质。如果没有城墙,城镇会变得无足轻重、简陋不堪。毫无装饰的城墙硬砖、耸立于护城河边上的堡垒和塔楼,俯瞰着周围草木不生的乡野。即使一些城墙存在的时间不长,但那些饱受侵蚀的墙砖和破败的高垒足以让它成为“年代久远”的古迹(图3)。尽管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修缮和重建,城墙的风貌通常没有发生大的变化^[1]。没有什么建筑比它们更能显示这片古老土地曾经的荣耀和伟大。

[1] 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伦敦,1924年,第1—52页。

3 祭台、平台和台阶



从建筑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很多建筑遗迹都与城墙紧密相关，但是没有一种建筑能像包围帝国、城镇、村庄甚至院子的围墙那样在建筑学方面形成基本特征。例如古时的楼台，上面往往矗立着门楼和亭子。因为楼台与其上层建筑的关系很紧密，所以展现它们的时候，上面必须有木质建筑。再比如用泥和砖砌成的塔与宅院，往往簇拥成群。后文在探讨中国石砌建筑时，我们会将它们作为其中一部分来讨论。但是在这里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国的祭台和楼台进行观察，因为它们一直都存在于中国古老的宗教建筑中。从建筑观点来看，它们代表着一种建筑类型，在中国建筑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人住宅的最早记载中明确提到，在住宅的庭院两侧，一边是祭祀土地神的祭台，另一边则是宗庙所在地。^[1]早期的祭台是简单的土丘或者泥筑平台，上面供有祭品，后来发展为用石板铺成的永久祭台。国家祭台的位置一般紧邻国君的住所。最初，所有有权向大自然各种神明献祭的人，其住宅旁都安置祭台；后来，祭神祭天的权力就只掌握在天子以及民族的精神领袖手里。所以，祭奠魂灵和神明的祭台在很大程度上与皇宫联系在一起。当然还有其他祭神的地方，比如五岳名山，皇帝经常驾临祭神。

从祭祀土地神的原始土丘逐渐发展为供奉自然中各大神明的大型平台，是否涉及宗教历史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我们讨论的重点是那些现存的遗迹和建筑外观。在历史的演进中，尽管历经多次朝代更替和建筑革新，却依旧存在的露天祭台及其不断的香火供奉，这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些祭台在中国人心中至关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这些祭台是皇帝精神领袖地位的象征，祭台上的神圣祭品，不论由皇帝本人供奉还是由皇帝指定的代理人供奉，都在表达一种寄托：天下臣民与帝王及神明和谐共处。

皇帝祭祀的祭台一般设置在王朝的都城外。汉朝有两个祭台，用于祭天的祭台在都城南端，用于祭祀地上神明的祭台在都城北端。不过，后来一些朝代的皇家祭祀都集中于一个祭台。例如，明成祖永乐帝于公元1420年重建北京城后，将皇家祭祀天地的大型祭台设置在都城南城墙外，称为圜丘。一百年之后的明世宗嘉靖九年，经过一批儒学名士的全面研究，皇帝决定分别祭祀众神，不仅建造了天坛、地坛，还建造了日坛、月坛，以及先农坛和社稷坛^[2]。从那个时候起，几个祭祀诸神的祭台就分别设立在北京城内外。

[1] 马伯乐 (H. Maspero), 《中国文物》(La Chine Antique), 巴黎, 1927年, 第24页。

[2] 关于祭台的历史资料取自1774年的文献《钦定日下旧闻考》。关于天坛的规划和构造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法国工程师普意雅 (G. Bouillard) 的重要专著《北京城及其周边》(Quatrième et Cinquième série of Pékin et ses environs) 的第四卷和第五卷, 北京, 1923年。

后来大部分祭台陆续得到修复或重建，尤其在清高宗乾隆年间，皇帝热心于古代仪式，大规模重修了祭台。不过这些祭台的总体特征和形态与嘉靖时期相比基本保持不变。

天坛是这些祭台中最庞大、最有名的一座。它坐落在北京城前门大街的南面，这里曾经属于皇城的城郊。天坛的围墙所围的面积很大，外围墙周长约 6.5 公里，外围墙的里面还有一个内围墙，周长超过 4 公里。天坛内树木很多，也有一些供祭祀典礼用的殿宇。不过在此我们仅就供奉祭品的祭台进行讨论。如前所述，天坛祭台有两重坛墙，形成内外坛，外方内圆，象征天圆地方。外坛东南西北四方的围墙上各有一座大理石牌楼状的雕刻拱门。圜丘共有三层平台，其中最低的一层直径 64 米，高 1.5 米；中层直径 46 米，高 1.6 米；上层直径 28 米，高 1.7 米，整个圜丘的总高度达 4.8 米。所有平台表面都由大理石铺成，周围竖有雕刻精美的大理石栏杆，设计风格与我们在北京皇宫所见到的相同（图 4A）。虽然天坛在乾隆年间重修过，但重修风格明显严格仿照明朝的规划和设计风格。天空湛蓝如玉，人们沿着圜丘的阶梯拾阶而上，可以看到大理石平台和精雕细琢的大理石栏杆营造出绝佳的装饰效果，尤其是在莹莹日光下，大理石散发出的华丽白色，映衬着周围的黛瓦红墙，视觉效果尤为震撼。天坛的建筑结构是远古时期的祭台无法比拟的，但其总体设计理念、形制以及静谧的环境仍然展现了早期的宗教传统。天坛内部矗立的各神殿是后来修建的，这一点将在另外的章节进行讨论。

与天坛相对的是位于北京城北部安定门外的地坛。地坛建成初期名为“方泽坛”，意为方形的祭台，公元 1534 年改名为“地坛”。与天坛相似，地坛外围也建有两道大型的围墙，但都呈方形。方形也是地坛主坛的特征，体现着“地方”的观念。地坛有两个平台，低层平台是边长 32 米的正方形，高层平台是边长 17 米的正方形，整个祭台高 1.2 米。祭台四周还环绕着宽 2.5 米注满水的壕沟。低层平台东西两边分别安置有两个小石龕，皇帝祭祀时，石龕上安放着各山神河神的牌位。平台侧面贴有黄色琉璃面砖（象征黄土的颜色），而过道则由灰石板铺成。四条过道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通往祭台。从过道向祭台方向走，通过外墙和内墙的两处大理石牌楼，到达通往祭台的两旁没有栏杆的宽阔阶梯。地坛整体的效果虽然比较简单，却不失庄严协调。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在壕沟和低层平台周围添加的灰砖栏杆破坏了整体效果。祭台附近是负责祭祀仪式的各个神殿，不过只有斋宫保存完好，其他神殿都因驻军士兵的掠夺而被破坏了。

先农坛位于北京皇城以南，与天坛东西相对，是为了供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农夫——神农氏而建（相传神农氏授人农耕）。每年春耕时节，皇帝亲率百官前来祭祀，把手放在农具上作耕田礼，以祈盼这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今，先农坛中保存较好的部分已开辟为公园，其中部分祭祀典礼用的神殿被改造为茶馆，两座供奉祭品的祭台虽然仍然存在，却已荒废不堪。这两处祭台最初叫作山川坛，用于祭祀山神和河神，公元 1530 年改名为天神坛和地祇坛。天神坛用作祭祀风神和雨神，又叫风雨

坛，地祇坛则用来祭祀五岳四渎之神。天神坛为边长 15 米的正方形，高 1.5 米，其北边安放着四个小石碑，碑顶为半圆形，碑身中空作石龕用（图 5A）。石碑上刻有美丽的云纹图案，表示其中供奉的牌位是风神和雨神。地祇坛是一个矩形平台，长 30 米，宽 20 米，四边各有宽阔的九级阶梯。地祇坛南边有五个小石碑，东西两侧各有两个，形状均与上述天神坛的石碑相同，体积稍大。小石碑上刻有精美的山川浮雕，在百年古松的映衬下，不仅使祭台的神圣气氛大增，而且使圣坛更加和谐美丽。

不过，明清时期祈祷丰年的祭祀活动不仅在先农坛进行，还在另一处祭台进行。这一处祭台位于北京皇城内，与太庙（皇室家族的宗庙）相对，叫作社稷坛。皇帝在此祭拜的是社神（土地神）和稷神（谷神）。与先农坛一样，在这里祭祀的目的也是祈祷新的一年能够风调雨顺。如今，社稷坛被辟为北京的“中央公园”。值得注意的是，社稷坛的祭台与其他祭台一样呈方形、高度适中，却不是石头铺成的，而是用五种不同颜色的泥土覆盖。祭台中央是黄土，北面是黑土，南面是红土，西面是白土，东面是青土。祭台围墙上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瓦的颜色与祭台四个方向的土的颜色分别对应。

北京皇城外的东西两面分别坐落着日坛和月坛。在日坛和月坛举行的祭祀活动是为了寻求太阳和月亮的保佑。日坛的围墙呈圆形，但中央的祭台是方形的。祭祀月亮的月坛，其围墙则是方形的白墙青瓦。目前日月二坛均处于完全破败的状态（图 6A）。

在北京各祭坛中，先蚕坛相对较小，但是整体上保存得更为完好。先蚕坛是为了祭祀蚕神所建。每年在先蚕坛举行的祭祀典礼由皇后主持，皇后是国家养蚕业的保护者。先蚕坛的祭台也是方形，用石头铺成，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通向祭台的阶梯。比较特别的是，先蚕坛的祭台位于北海北端一排古老的桑树之中（图 6B）。祭台的旁边是采桑台，祭祀时皇后可以站在上面采集桑叶。采桑台再往北，是一个单独的浴蚕池，用于皇后洗蚕。后面是亲蚕殿，皇后在这里祭拜蚕神。先蚕坛的神殿建成相对较晚，不过由于环境布置优美，整体比较美观。整个先蚕坛保持着一种对世间万物的亲近感，正是这种情感促成了以上所有露天祭台的建立。

总之，祭台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传统信仰，而且建造精美，具有建筑学意义。中国的建筑无论建造目的如何，其底部都有平台支撑。平台上面的建筑越重要，建筑底部的平台也就修建得越大、越华丽。壮观的寺庙和宫殿经常建在两层、三层甚至更多层平台上，而普通的民居一般建在石头铺成的平台上，平台的阶梯也是一二级。从本书展示的大部分建筑都能看到这些特征。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平台，旁边带有斜坡。

一般来说，平台的形状和轮廓取决于它的上层建筑。平台可以是矩形、方形或者圆形，高度则与平台所在的地势以及上层建筑的特点和用途有关。一般建在平面上的住宅，其平台高度不超过 1 米；如果建在斜坡上，或者作为高层建筑的基石，平台正



面高度可达10—20米。平台的形状与城墙的箭楼或城门的平台类似,建造方式也相同,内部是泥浆和碎石的混合物,外面则覆盖厚厚的砖层。

关于平台的上层建筑,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介绍。这里需要介绍一座非常壮观的平台式建筑,这就是陕西北部榆林的长城古堡(图7A)。这座方形古堡是一个三层平台,平台最底层是边长28米的正方形,古堡高度比宽度稍小。底层平台的通道位于古堡后方,是在泥层中间挖空的。若要进入上层平台只能通过外面的斜坡。层层堆叠的三层平台依稀可辨,光滑坚固的墙面最初应是有垛口的,如今大都不复存在,只剩下大致的结构。不过所有这些已经足以使古堡成为一座伟大的建筑。古堡与古巴比伦或中美洲的台阶金字塔相似,只是在单调的沙漠中座座沙丘的映衬下,看上去更加朴素。

在以黄土为主体的自然地形中,梯形平台可以说是最普遍的建筑特征了。中国北方无数的斜坡被改造成阶梯平台,用来耕种或者修建房子。除了简单地依山开凿洞穴居住外,这里的房子通常都由结实紧凑的黄土筑成(尤其是顶部)。如要严格遵照“建筑”的词义,这样的房子算不上建筑;但是房子建在平台上这一中国北方普遍的建筑特征在这里也可以见到。简单的黄土平台与山中寺庙的青石板平台本质上差别不大,只是后者建筑特点更加清晰,而且还发展出了环绕的栏杆和通向平台的长阶梯。

平台在中国建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分布也非常广泛,因此成为中国建筑中仅次于屋顶设计的独特特征(图8A、B)。这一点在一般的房子上感受不深,因为它们建在较低的平台。但是如果走近中国的寺庙和宫殿,我们立刻会感受到这种明显的特征,被其独特的美丽和壮观所震撼。寺庙和宫殿的平台往往分为几层,层层延展,周围环绕着大理石栏杆。通向平台的台阶很宽阔,中央铺有雕龙石板。在低层平台上可以看到,上层平台设置了一排伸出来用作排水口的龙头。这些龙形排水口还具有装饰作用,与平台上红色的木质殿宇相得益彰。

在中国北方,大多数保存至今的宫殿型大理石平台主要建于明朝及以后。这些平台主要分布在北京的故宫、天坛、明十三陵(图9A)以及其他皇家建筑中,它们设计精美,细节装饰也雕刻得很到位。在开封,有一处皇家建筑平台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这就是著名的龙亭。龙亭平台的上层建筑曾经是宋朝的皇家宫殿。当时的开封叫作“汴梁”,是北宋的都城以及后来金国的陪都,建有大量的皇家建筑。现在的龙亭平台虽然经过了后世的修复,但其装饰性的雕塑仍然原样保留了下来,显示出北宋时期的建筑装饰风格(图10A、B)。

龙亭平台的中央部分高高突起,离地面将近20米。平台中间有一条长长的阶梯,阶梯中央铺着的御道上刻有盘龙和祥云浮雕,这属于明朝以前的样式。与北京故宫的大理石御道不同,这里的御道是用石灰岩铺成的,平台周围的栏杆用的也是相同的材料。现在龙亭平台的上层建筑是后来重修的。平台的侧翼部分相对较低,又分为数层

平台。侧翼平台可以从单独的台阶登上，从低到高，平台的宽度渐渐变窄，消失在最高处。平台的侧翼部分可能是后来修建的。中央部分像一个堡垒，侧翼部分呈阶梯式上升，两者结合起来，使整个平台引人入胜。除了固有的宏伟紧凑，其完美的分布比例和恰当的纵横比例让人印象深刻。

通往高层平台、堡垒和城墙，还有一种没有阶梯的斜坡大道，中国人称之为“马道”，意思是此道是骑马上城的通道。马道是古代防御性城墙的必备结构，重型货物可以直接运输到城墙上。为了便于登上城墙，马道的坡度一般比较平缓。

建在山腰的寺庙等建筑，平台下的石板台阶铺设得更加精细，栏杆的装饰也更加精美。阶梯的上升线与平台的水平线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尤其是沿着连续的台阶拾阶而上时，感受更加强烈。平台阶梯的建设与地形和周围的环境紧密相关，但是总体来看，不管是在平台的正面还是与平台形成了一个合适的角度（图 7B、11B），阶梯都呈直线型。在中国，弯曲的台阶很少见到，一般只用在花园的一些别致设计中，往往通向假山或者高处的小亭子。又长又直的台阶体现得最典型的地方就是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和北海的永安寺。这些寺院的主殿沿着山坡的直轴线而建，通往主殿的阶梯形成了“天梯”，越往高处走越陡（图 12）。在每段阶梯的停顿处建有装饰性牌楼，既将阶梯清晰地分成一段段，又打破了阶梯又长又直的单调性。一些平台的侧斜坡则通往毗邻的建筑，与主建筑的中轴线形成合适的角度（图 11A、B），坡度一般比较平缓。不同方向的阶梯组合，使整个建筑结构更加耐人寻味。不过，与意大利的花园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别墅不同，中国式的斜坡和阶梯似乎不是为了装饰，而是具有严格的实用性，外观的总体设计很简单。即使要表现壮观效果，也不会只从阶梯本身考虑，而是会考虑阶梯所处的位置及其尺寸。当然，在中国，最震撼人心的阶梯是泰山、嵩山等长达数公里的山间石阶小道，而不是寺庙宫殿平台的阶梯。这些山间石阶小道的的设计严格遵照自然地形，符合中国建筑常见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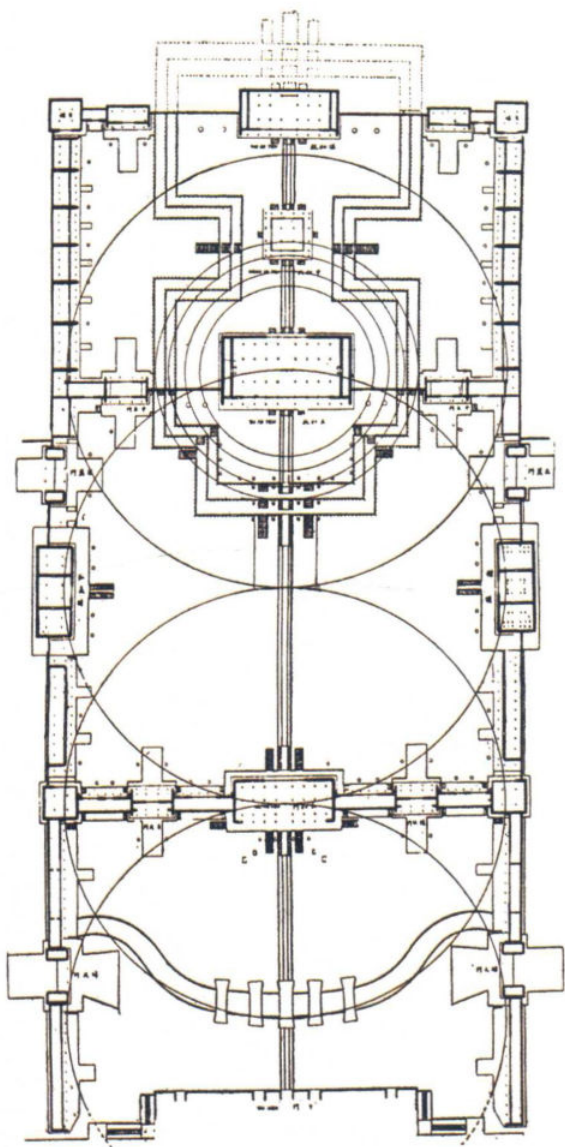
不过，真正精美的阶梯还是那些通往皇宫和寺院平台的主台阶。这些台阶完全用大理石砌成，从平台底层缓缓上升到二层、三层。台阶两侧的大理石栏杆精雕细刻，雕刻图案呈螺旋状。台阶的宽度与其高度相称，坡度轻缓，每级台阶都比较低，宽度足够容纳一只脚，给人一种缓慢沉着的感觉。阶梯中间偶尔凹陷下去，显得两边的斜坡相对较高，比如通往午门的阶梯上半部分。皇宫中央台阶的设计采取中间抬高、两边凹陷（图 13A）的典型样式，中间抬高的部分装饰云龙云凤浮雕，象征皇帝和皇后。皇帝皇后通常坐着特别的肩舆通过御道（图 13B），御道中间的石板装饰着一层厚厚的动物图案浮雕花纹。这种装饰性石板既增加了阶梯的斜坡效果，又使整个阶梯看上去有一种敞开的感觉。

这种台阶是整个平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高高在上、柱廊环绕着的宏大宫殿形成完美的搭配，但只能在皇宫里才能见到。在北京故宫里，它们的确是最显眼的建筑特征，同时也是皇权的象征，不允许平民百姓随便修建和使用。



4 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类型和特征——木质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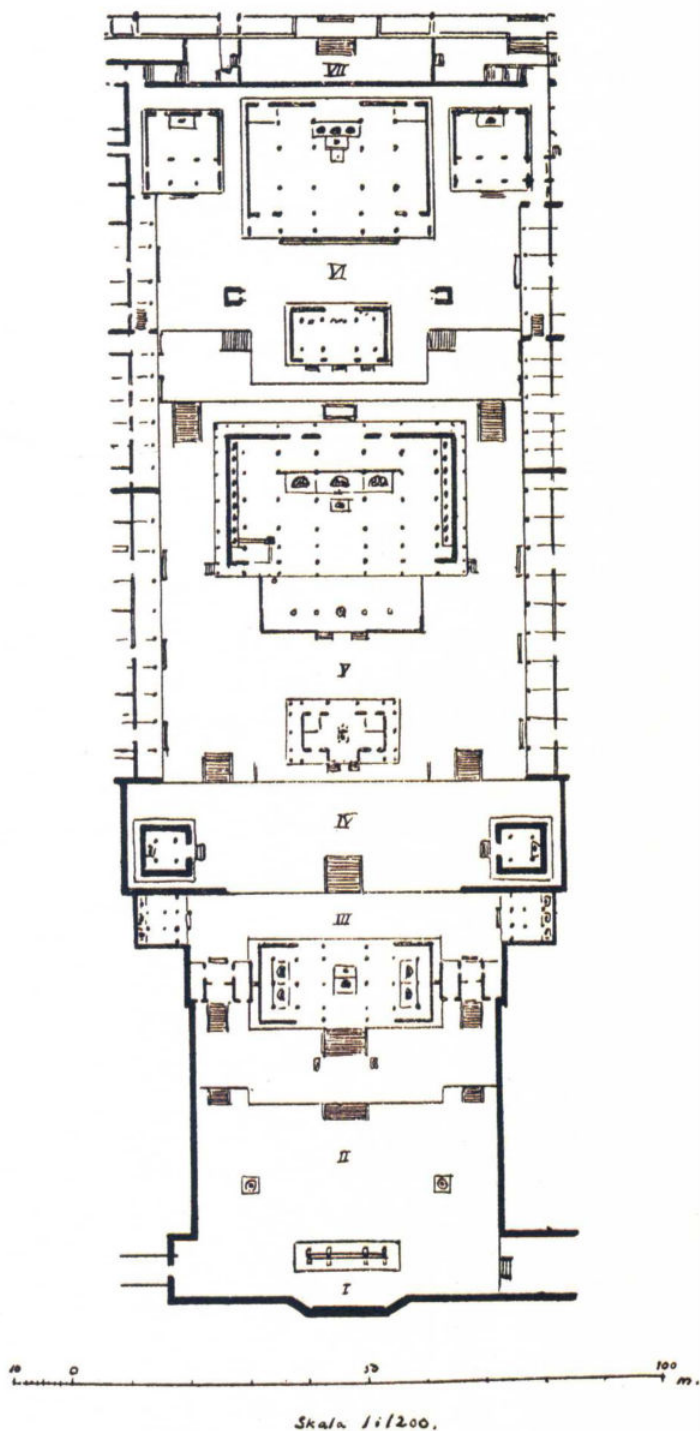
前面提到，目前现存的中国建筑遗迹大部分修建于较晚时期，因此从建筑遗迹中探寻古代的建筑材料不太现实。但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展示一些对中国建筑要素的观察。在此之前，我们需了解中国建筑的总体设计规则，这些设计规则在很早的时候就被中国建筑工匠们继承了下来。我们主要讨论中国建筑中比较重要的特征，对于中国各地的不同建筑特征以及技术性问题暂不作讨论。当然，若要对中国的建筑材料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就必须对



瑞典画家阿尔宾·斯塔克 (Albia J. Sturk) 笔下的故宫三大殿图。
图中的内切圆表示故宫建筑的比例。

各地的建筑遗迹进行研究，但这需要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专门撰文详述。限于篇幅，本书主要讨论中国古代中原及北部地区的建筑材料，阐述中国建筑的普遍标准，忽略不同地方的具体差别。

在中国古代，不论寺庙、宫殿还是宅邸，只要没有不可抗的自然阻挠，大型建筑结构一般都严格遵照一个特点：坐北朝南，沿着一条主轴线，呈对称分布。在很早以前的夏商时代，对建筑的描述就遵循这个原则。后来不管是出于宗教原因还是实际考虑，这个原则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各主殿从前到后，排成一排。主殿前面是宽阔的庭院，周围环绕着偏殿，前方有围墙及入口。如果是宫殿和大型寺庙，主殿则矗立在高高的平台上，前方是柱廊或走廊。根据中国建筑的傳統特点，所有主殿都朝向南方。另外，大型建筑群除了有一条主轴线外，还有侧轴线，侧轴线上主要分布着偏殿，分布规律与主轴线上的分布规律相同，侧轴线与主轴线永远保持平行关系。唯一和轴线成一定角度的建筑是侧门、库房以及走廊等，它们一般建在庭院的四周。古代的建筑群都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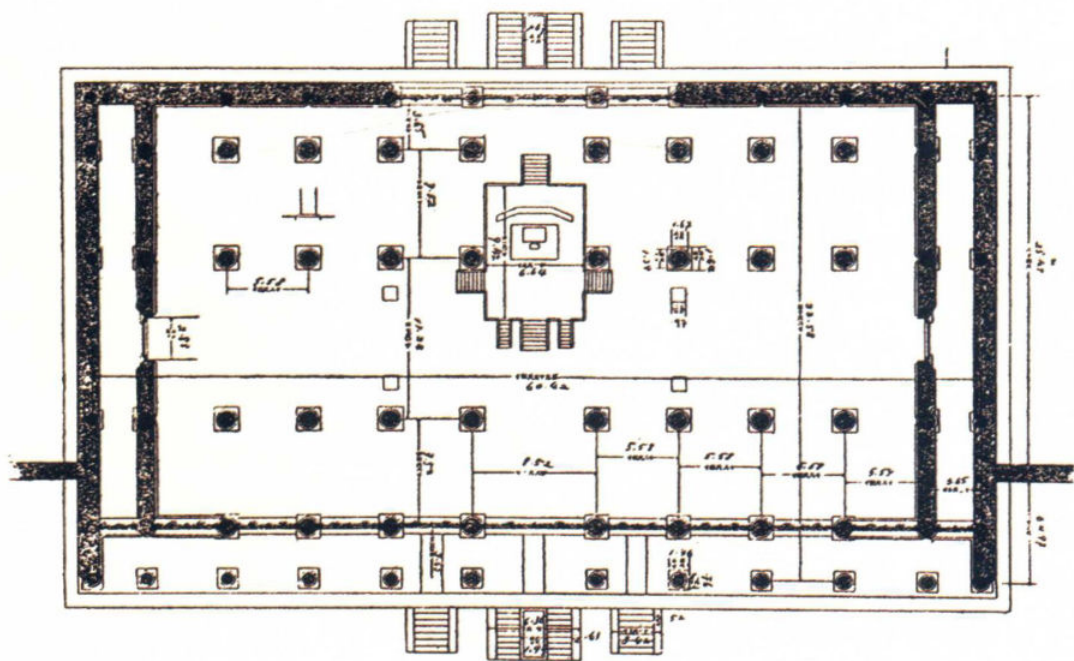


柏石曼 (Boerschmann) 笔下的
中国大雄宝殿典型设计图

这样的庭院为一个单元一进一进地扩展开来，既非单个建筑的无规律扩展，也不增加建筑的高度。北京的一些亲王府邸，院落规模多达二十进，其中的古老楼阁和殿堂数量则更多。如前所述，整个建筑群都被高高的围墙环绕起来，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在一些更大的宫殿群中，不同的庭院之间也由装饰性的门墙隔开，这样不仅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分属不同庭院的人也只能在各自的庭院范围内活动，整个宫殿也就成了真正的“禁城”。

不论寺庙、宫殿还是宅邸，建筑物的类型都具有相似的样式。以最主要的“殿”为例，其外形一般为长方形，内部被一排排柱子分为两三个区域，其中最重要的区域就是柱廊。不过，如果整个建筑四周都被柱廊包围着，就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了（图 14A、B）。方形建筑都是类似的样式。当然，多边形或者圆形建筑也有一些特例，这将在后面叙述。建筑的采光一般依靠门上半部分的透光以及一些低一点的窗户射进来的日光。窗户划分为一个个小窗格，空隙用一些透明纸罩着（现在一般换成了玻璃）。一些大型建筑往往有两层屋顶，在两层屋顶之间会设置一排窗户。而在较低的建筑中，侧墙一般没有窗户，后屋的采光主要依靠后门和后窗。方形大殿的四面都是正面，都设有门窗。

建筑本身的重要性不同，其样式也各不相同。如前所述，建筑都建在一个平台上，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平面图